

马伯煌

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ONG GUO JIN DAI
JIN JI SI XIANG SHI

中册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六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中 帖

马伯煌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302号

责任编辑 陈惠丽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中册)

马伯煌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87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精装 150

ISBN 7-80515-737-5/F · 219

定价：(平) 4.60 元
(精) 10.60 元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马伯煌 主编

参加编写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 枫 陈正炎 杨 敏

林其锬 郑 韶 钱小明

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马伯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全书上、中、下三册共计100万字，于1985年10月完成初稿。同年11月初，邀请京、沪、汉等地一些教授、专家、学者会同评议，认为此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于体系、论证和征引资料各方面均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并能填补既有成果之所未及。

此书编写要求主要有三：第一，以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经济思潮的主流与分流的突出点作为系统而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证出在解放前的一个世纪当中，中国社会经济虽然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一切改革和挽救的政策措施又先后都告失败或无效，但广大中国人民，在各种经济思想派别的漫衍潮流中，能够激浊扬清，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革命的根本原则。这种勇于进取、善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

第二，既不因人论事，也不就事论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忘记“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①因此，历史上的正误或成败，不应完全归之为个人的功过。正如本书上册《绪论》中所提出的，如果不从历史发展

的必然来考察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把一百年来的爱国与图强、改良与革命的各种思潮和运动，视为个人的遗事、民间的闲话、历史的插曲、时代的浪花，而从中看不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正义与邪恶的不断斗争，把历史局限在按史料讲故事、为前人算旧帐的框框内，则将失去历史研究的主要意义，而难以做到历史为现实服务。

第三，这部书也补上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30年间，中国社会各派经济思想的纷呈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壮大的过程，显示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们筚路蓝缕、遗大投艰的开创缔造精神，以及他们在经济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策略。当然，本书对这一复杂而曲折的革命过程的历史论证，仅是一个开端，有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研究，充实完备。

兹当本书中下两册获得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得以全部出版之际，预期这一科研成果能在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显示其意义和价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丁日初 蒋立
1992年4月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7页。

目 录

序.....	(1)
第三篇 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形成及其经济思想的 前进与后退	
第六章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兴起…	(1)
第一节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兴起的根源…	(1)
第二节 改良思潮形成阶段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 思想.....	(3)
一、改良思想的初期形成过程.....	(3)
二、改良思想的初期内容和特点.....	(9)
第七章 维新思潮高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 想.....	(22)
第一节 洋务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分歧.....	(22)
第二节 维新派的主要经济思想.....	(24)
一、平等互利，开展对外贸易.....	(24)
二、适时而动，改变经济措施.....	(25)
三、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26)
四、俭与奢的关系.....	(30)
五、金属铸币与发行纸币的关系.....	(32)
第八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分流.....	(36)
第一节 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分流及其反映.....	(36)
一、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经济学科范畴的初步区 分.....	(36)

二、自由放任与干涉保护的折衷	(42)
三、以“大同”寄托幻想，用“移民”寻求出路	(55)
第二节 改良思潮的没落	(62)
一、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态度的反动	(62)
二、康有为经济论点的倒退与梁启超对财政货币问题的主张	(64)

第四篇 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及其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分化

第九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纲领的提出及其与改良主义者的论战	(71)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	(71)
一、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	(71)
二、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的初步提出	(74)
第二节 革命和改良两种经济思想的论战	(79)
一、关于土地制度的不同选择与争论	(80)
二、资本问题：垄断与反垄断之争	(94)
三、关于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的关系问题的争论	(101)
第十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108)
第一节 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	(108)
一、关于民生史观	(108)
二、民生主义的特点及其思想渊源	(110)
第二节 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思想	(118)
一、论平均地权	(118)
二、论资本与节制资本	(134)
第三节 革命派的经济建设主张和方略	(147)
一、关于振兴实业的目的与条件问题	(147)
二、突出重点振兴实业的思想	(156)
三、关于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	(164)

第十一章 抵制外货、“实业救国”思想的风行及国民党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分化	(173)
第一节 人民抵货运动的兴起和“实业救国”思想的流行	(173)
一、人民抵货思想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	(173)
二、抵货思潮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和影响	(175)
三、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抵货运动新形势	(177)
四、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救国”思想的风行	(183)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208)
一、革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条件	(208)
二、平均地权思想的发展：“耕者有其田”	(211)
三、节制资本思想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垄断	
断	(216)
第三节 国民党内部派别经济思想的分化	(218)
一、国民党内部派别经济思想分化的根源	(218)
二、右派经济思想的蜕化及其反动性质	(223)
附录一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事记(续上册)	(231)
附录二 本册所见主要历史人物简介	(238)
附录三 本册主要参考资料	(251)

第三篇 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形成及其经济思想的前进与后退

第六章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兴起

第一节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兴起的根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从两个途径产生的。第一个途径是由上层有产者转化而来的，即因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投资于新式工业而产生的。第二个途径是由中下层社会上升而来的，即因一般私人资本（包括国内经营或海外谋生中积累的资财）投资于工商企业而产生的。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走的道路互有不同，其经济利益要求和政治态度也是不同的。但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阶级性却基本相同。

由封建地主、官僚和买办转化而来的上层民族资产者，有一般资产阶级所共有的要求：在经济上要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要参与政权，这一部分资产者由于是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出来的，因此，他们同封建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经济上常常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政治上常常是资产阶级改革派兼官僚、买办，可谓一身而二任。

由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转化出来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同封建的经济、政治联系密切，渊源较深，瓜葛颇多。因而也决定了这一部分民族资产者的脆弱性：在经济上既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又始终不敢正视和触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障碍封建土地制度。在政治上，既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但又不能、也不敢提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在思想上，既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但又摆脱不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羁绊，常常以“西学源于中学”、“托古改制”等鼓吹自己的主张。

改良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继洋务思潮之后兴起的一个思潮。作为时代思想的历史演进来讲，它上承洋务思潮的渊源，下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前鉴，构成近代思想历史发展链条的中间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出来的。到了19世纪末期，诚如前章所说的，重商主义理论思想，已趋于没落。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想的没落，全面学习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思想油然而生。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产生的思想根源。

经过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的检验，证明了洋务运动的无效。首先是一些先进有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国已陷于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中，企图步日本的后尘，要求开展一个全面改革的变法维新运动。诚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当时“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入学。”^①这是资产阶级改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75页。

良思想产生的政治根源。

洋务思潮和改良思想都主张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同那些死抱“因时之政，今昔异宜，致治之方，终古不变”^①的守旧派相对立的根本所在。但是，由于认识上有个由局部到全面、由表面到深入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基础以及阶级利益和要求不同，因而在学什么、怎么变上面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异。改良思潮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上要求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即全面变法，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它在经济上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经济制度，摆脱封建主义束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实际上是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并“以兵卫商”，抵御外国资本，收回利权，用政权的力量，保护民族资本，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上，废“旧学”，兴“新学”，即全面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发展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改良思潮主要是代表由封建地主、官僚、士大夫转化出来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同封建主义有较深的渊源和利害联系，这又使他们不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而在变革中，这一阶层的多数走的只能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

第二节 改良思潮形成阶段资产 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一、改良思想的初期形成过程

^① 丁立钧：《论洋务奏》，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9页。

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经济思想的产生，是与中国民族资本力量的增强和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加深，以及洋务运动的日趋没落同步发展的。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战争暴露了洋务派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的无功。许多为谋求中国富强而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此时已逐步醒悟过来。他们在学习西方经验及对洋务派的评论中，酝酿着一种新的经济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洋务派在经济思想上的对立，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这三个方面是：一曰“变”，是：“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而对祖宗“旧制”则要“万世保存”，“决不会进行这样变革”^① 呢？还是不仅学习西方的“富国之末”，而且还要学习西方“富国之本”，即不仅“变器”，而且要“变道”，实行“君民共主”，“振兴商务”？二曰“权”，是：对内“君权至上”，对外“悉依洋人”呢？还是内“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外行“商战”，以挽“利权”？三曰“利”，是：“困商”、“剥商”、“害商”呢？还是“助商”、“护商”、“保商”？总之，“变”、“权”、“利”三个方面，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分歧点，实质是：改变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是全面地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不准逾越封建主义。

在改良思潮酝酿兴起的阶段，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还是幼稚的，许多论点还不那么清晰。但它已在上述“变”“权”“利”三个方面，逐步脱离洋务思潮的轨道而露出其思想的端倪。

①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63～64页，转引自王晓秋，《清末中国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载《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44页。

最早提出改良主张并具有经济内容的，是第一个中国留美毕业学生容闳。他早年赴美国留学，1854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因此，他“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①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程度，远比他人为深。他又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虽受外国教育，因未失其中国固有之道德。”^②他抱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愿望，在大学毕业后，拒绝了留在美国工作的邀请和要他当传教士的建议，于当年毅然归国。他1855年回国时，正值“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之际，他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一个夏天便杀了“七万五千余人”，但见刑场上“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被杀者大半皆无辜冤死。其中一些被杀者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③因而他对清朝统治者无比愤怒，斥责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杀，不独今世纪无事可以比拟，即古者尼禄(Nero)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④于是“愤懣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正当。”^⑤1856年，他由香港到上海，经过对产桑区域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广泛社会调查，于1860年11月亲自去访问太平军。当他到达南京进谒于王洪仁玕时，坦诚地谈了七件事：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①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30～31页。

④⑤ 同上书，第31页。

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同时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①

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未能接受，只给他一个空头的“义字四等爵”。^②同时，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太平军的两面性：既与中国几千年来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有所不同；又有“成份不纯，走向腐化”的同一趋向；并指出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的腐化情况。^③他感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1863年，他遂应曾国藩之邀到安庆去会见曾氏。在安庆期间，他提出建立基础工业，设立既分工又合作的“子母厂”的建议。他认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有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亦即“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在他看来，中国有“原料之廉，人工之贱”的优势，因此他预言：“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④。容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这就是从建设重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入手，逐步发展专业化工厂，齐全工业部门，最终形成不依赖欧美的独立工业体系，以适应“中国幅员之大”的需要。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理

①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

③ 同上书，第61～62页。

④ 所引均见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5页。

想。后来，江南制造局的诞生，不仅同他的建议有关，而且“其中各种紧要机器工程无不全备者”，亦同他实际参与购办机器有关①。他为求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于1867年，又倡议在江南制造局“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②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早期的机械工程师。同时，他又在老友丁日昌支持下，撰写条陈四则，由丁日昌转寄北京。这四则条陈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③上述这些建议，当时虽未实施，但后来设立轮船招商局，选派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以及开采煤矿等，同他的条陈不无关系。直到1896年，他仍拟游说清朝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具体计划：“由政府预算一千万两之资本，以为开办费。中以二百万两购置各种机器，以鼓铸银币、印刷国债券及一切钞票；以二百万两为购地建屋之用；所余六百万两存贮库中，以备购金、银、铜三者，将来铸成各种泉币，以流通全国。此一千万两，只足供国家银行第一年之开办费。将来中国

① 参看《西学东渐记》第14章“购办机器”，第77～78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5页。

③ 同上书，第86～88页。

商业发达，则国家银行亦当随商业发达之比例，而逐年增加其资本”^①，可是这一计划被盛宣怀破坏了。他还提出建设由天津直达镇江的铁路计划，成为后来建筑津浦铁路的张本。他也参与过戊戌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他“不得不迁徙以逃生”，^②先到香港住了两年，遂归美国。除了1901年曾到台湾游历之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们综合容闳的思想可以看出：一、他主张全面的变革，而不是局部的改革。二、以欧美为榜样，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要引进先进技术，而且要维护主权，反对外国侵略和干涉；要从兴办基础工业，开发矿山、发展交通着手，充分发挥本国原料廉、人工贱的优势，同外国资本竞争，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要通过创办实业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办法，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四、建立银行制度，组织民办公司，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其发展。容闳虽然没有公开正面批判洋务运动，而且他还实际参与了洋务派兴办实业的某些活动，甚至对推行洋务运动的曾国藩还有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思想和洋务派的思想是不同的。容闳的思想所以远远高出资产阶级初期改良派中的许多人，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熏陶的结果。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在回国之后又广泛地接触了社会，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清朝的腐朽极为不满，这就使得他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但是，他的思想虽然先进，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主流，因为在那个时候，即使先进分子，也会囿于时代的局限，难于达到成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8～119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